

随笔

黄姚豆豉

王祥夫



《闲适》

汪伊虹

作

不知是哪位哲人曾经说过,人的幸福就在于做最简单的事吃最简单的饭。但生活毕竟是复杂的,若在复杂之中能够找到让人喜欢的简单,亦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。所以至今总是记着在黄姚镇北菜村吃白米饭就青椒炒豆豉,竟然会那么好。简单的饭,让人欢喜,就像我平时吃白米饭喜欢倒点酱油在里边,所谓酱油拌饭亦是简单的好,至今还喜欢这样。

黄姚是广西名镇,第一大名物就是豆豉,据说有近千年的历史,我倒没有看过这里的县志,府志有没有我也不得而知。但黄姚最早发祥于宋朝年间是可以肯定的,但究竟为什么叫了“黄姚”?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这里最早居然只有两户人家,一户黄姓一户姚姓。北宋皇佑四年,狄青率部南征依智高,其部将路经黄姚,派士兵打探路线,得知当地只有黄、姚两户人家,于是就把此地称为黄姚。现在的黄姚镇上据说已无姚姓,而黄姓也是清代后才从外地迁入,亦不是原来的黄姓。民间的说法还有另一个版本,是说黄姚最早的居民是黄姓瑶族,以种红薯、水稻为生,他们把农产品挑到姚江下游去出售,如有人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,便有人会告知是黄姓的瑶族人从上面挑下来的——比如说黄姚这大大有名的豆豉,如果有人问,哪里来的豆豉啊?答曰:黄姚来的豆豉。久而久之,豆豉跟上黄姚出名,而黄姚也跟上小小的豆豉出名了。

黄姚出好豆豉,这个好不是今天才好,是早就好了起来的,豆豉不单单是炊饌离不开的东西,而且是一味有名的中药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:“黑豆性平,作豉则温,既经蒸煮,能升能散,得葱则发汗,得盐则止吐,得酒则治风,得蒜能止血,炒熟能止汗。”简直被说得有几分神奇了。

说到豆豉,就我而言,可以说是从小吃到现在,但一到黄姚,好像那么多年的豆豉都算是白吃。那天吃午饭的时候,厨房端上来一大盘绿辣子炒豆豉,想不到真是美味,只以这绿辣子炒豆豉下饭,忽然就下去了三碗白米饭。在家里,豆豉总是当做一味配料来做菜,比如炒苦瓜,比如炒茭白,做鱼做鸡自然也离不开。而单独用碧绿的辣椒炒一盘来下饭以前还是很少这样吃。说到地方名物,豆豉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东西,但黄姚豆豉之名气实在是大的了不得,而黄姚豆豉又要数杨晋记的为最好,我又独喜它咸口味的。没事捏几粒放嘴里喝茶也别有风味,杨晋记豆豉的包装很有古意,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牛皮纸袋子,上边印着大红色的木版画和文字,颇让人怀旧,怀旧在当下,已经可以算是情感上上签。

纪实

这是引起世界关注的重要发现。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人的能力和智慧。

钱三强真诚、热情,有一颗赤子之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巴黎沦陷,钱三强代一位法国朋友保管一架德国制照相机。撤退时,他把自己的东西丢弃了许多,却把法国朋友的照相机带在身边。不料,在通过一座大桥时,守桥的法军士兵竟把持有这种相机作为判别德国间谍的依据。在战时,军队可以随意处死他们认为是敌方间谍的人,钱三强为此险些丢了性命。

1947年,他的好友汪德昭要回国,名义是“为老母做寿”,实际上是投身于东北战场,去配合“东北剿总司令”卫立煌举行战场起义。钱三强

亲自扛大箱提小笼,送汪德昭夫妇到机场,还凭着他他和机场管理人员的良好关系,使汪德昭超重的行李得以顺利放行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,汪德昭院士谈起钱三强的古道热肠,还是赞叹不已。

钱三强对朋友真诚、热情,对祖国更是如此。在清华读书时,他就参加了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。在12月16日那天,他和北平的爱国学生一起,高呼着抗日口号,举行示威游行。当队伍行进到西便门时,和军警发生了冲突。钱三强以当年拔河队员的体魄,和同学们一起,把被军警抓走的同学拉回来,又冲开了军警的封锁线,自己的衣服被撕破了、身体被碰伤了却全然不知。

1948年,中国大地硝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2

边东子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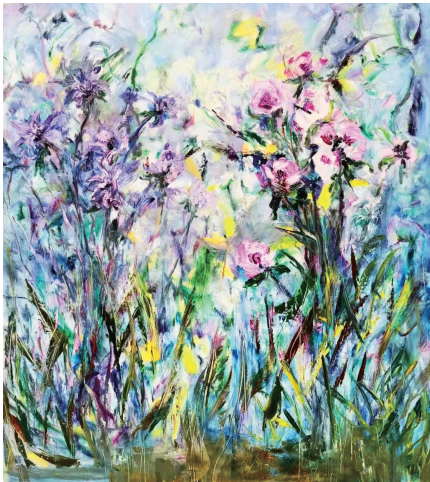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烟正浓,战火正酣,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却想回国了,这让他们的朋友感到意外,他们在法国生活得不是很好吗?他们事业有成,家庭美满,法国又是世界公认的科学昌明、文化优秀、生活优裕的国家,为什么偏要回到那个战火纷飞,贫穷落后的中国去呢?

心语

春到长门

介子平



《花语》高凡作

春光已然明媚,心情依旧沉闷。情绪的忽升忽落,没有表象原因,却有深层理由,不是故作沉默,只是懒得诉说。天地之间,千变万化,如蜃楼海市,与过影何异。

春到长门春草青,大地不老,只是人老。越老越慢不下来,慢下来的只是迟缓的行动,心越发得急。席慕容

喝酒、谈天说地,个个聊得神采飞扬,喝得满面红光,思乡之情、过年之乐尽在酒席之中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卫东厂一老乡家从山西带回一个饸饹床子,消息很快在两厂老乡中不胫而走。此后的十年间,这个饸饹床子便开始了在老乡间的游走“生涯”。“床子”是杂木的,硬度高,搬着不轻,记得有年夏天我“奉命”去卫东厂借“床子”,顶着烈日,扛着“床子”,走着山坡路,来回四十多分钟。好在老乡间慢慢形成了默契,“床子”只借不还,谁家要用就上家搬。

与借“床子”的辛苦相比,压饸饹可是个力气活儿,还得配合好。一般都是三个人,一个扶、一个压、一个弄面。我力气小,每次都是负责稳住“床子”不滑动、不歪倒;我哥哥负责压杆;母亲是主角,揉面、煮面、捞面。压饸饹讲究一气呵成,一旦开压就必须把“床子”里的面均匀快速地全部压出,否则会出现断面和生熟不均现象。这就要求压杆的人持续不停顿地一压到底。压饸饹遇到家里人手不够时,就会临时拉上隔壁老乡、开朗热情的韩大爷来帮忙,反正各家的厨房门都朝着走廊,喊人帮忙也方便。压杆压到底后,剩下的活就是母亲的了。细细长长的圆面条,一头已深入开水锅里,另一头还齐刷刷地挂在“床子”底部。但见母亲拿起一根筷子,将筷子头伸进面条中间贴近“床子”底部,然后快速朝一边一拨,接着再拨向另一边,动作娴熟而利落,面条被整齐地“斩”落锅中。

改革开放之后,父母从老家买回一个手摇式钢结构饸饹床子,用起来方便还不费力,可印象中只用过一次便闲置。前几年回老家我买回一种很小巧的饸饹用具,只需双手一拧就行,方便省力,但也极少使用。

不久前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家里聊天时,说到小时候吃饸饹的趣事儿,大家对压饸饹的艰难记忆犹新,对父母那时吃饸饹的热情倍感解。谈笑之间,我不得不想起手摇式饸饹床子的束之高阁,忆起父母离休后频繁回乡的情形,忽然间若有所悟。其实,不论是春节时母亲制作的馅饼等多种山西美食,还是大费周章的饸饹,与其说吃的是美食,不如说吃掉的是思乡之愁。

说:“喜欢坐火车,喜欢一站一站地慢慢南下或者北上,喜欢在旅途中间的我。只因为,在旅途的中间,我就可以不属于起点或者终点,不属于任何地方和任何人,在这个单独的时点里,我只需要属于我自己就够了。”起点终点之间,钱钟书的话更为概括:“人生不过是居家,出门,又回家。”往往宝马雕车,笑在开始,梧桐萧落,哭在半路。有道是怕吃苦,吃一辈子苦,不怕吃苦,吃半辈子苦。读书不苦,不读书的人生才苦,而无知之乐,恰在无忧。贪书而饥,不若贪货而饱;贪书而劳,不若贪货而逸。读书人都是夜里需要光亮的。

折子戏里总有一出情感唱段。扫娥眉,点朱唇,撩人春色似少年,“那一答可是湖山石边,这一答似牡丹亭畔”。我在远方,惜君如常,等雪来,等梅开,等你来,等待多是付出得不到回报的行为。某些人只堪想念,不便联系;有些事只堪关注,无需叨扰。天涯海角平安否,两处沉吟各自知,时过境迁,最忌相见,已非当初少年。今年元夜时,不见去年人,沈从文《边城》里有一句:“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,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。”也无风雨也无晴,喜剧悲剧之间,尚有一出平剧;无灾无难到公卿,欢调苦调之间,尚有一曲平调。

一物一形,山川河流四季有异;一叶一貌,树木花草南北不同。网络时代,无限链接,青山绿水依旧,来来往往人异,但每个人脑际,存着不一样的秩序。人生如寄,一走经年,多少疑惑纠葛,如一条发错的短信,没有回音,只得自设自答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72

张卫平
著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张干丞站起来来回走几步,激动地说:果然是个好办法!我咋就想不起来呢!

董一飞说: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,听说赵承授他们就是自己给自己印票子。

赵承授是晋绥军骑兵第一军军长,在兴县建有印刷厂。

刘象庚几口把碗中

的稀饭喝完:阎锡山的大花脸印得太多了,不值钱啦。

张干丞坐过来:刘先生,您见多识广,下一步该怎么办呢?
刘象庚放下碗:我也没弄过,但咱山西人有办票号的经验。银行不就是过去的票号吗?票号讲究的个信誉,银行也一样,没有本金兑换也不一样,就失了信誉。

董一飞只懂打仗:开银行还需要钱?

刘象庚家里经营着店铺,懂得一些生意上的事。刘象庚说:做生意要本钱,我们这是做票子的生意,当然耍本钱啦!没有本钱,银行的票子不值钱,没人用!

张干丞又忧愁起来。刘老伯说得对,开银行需要本金。可是,县里

没有钱,财主们又刚刚捐了款,群众们生活艰难,开银行又非一般生意,需要一大笔资金啊!

几个人不说话,埋头吃饭。

白宝明听不明白他们说的白,但知道他们是在干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。

董一飞看看刘象庚,又看看张干丞:县长说过,活人还能叫尿憋死!就能没办法了?

刘象庚直起腰看住张干丞:我去见见牛掌柜,和他合计合计,看他有什么好主意。牛掌柜做生意多年,或许牛掌柜有办法呢。

刘象庚是个急性子,他想做的事立马就要去办。董一飞说:牛掌柜没回蔡家崖,我看他去了复兴隆。

小说

回味

舌尖上的乡愁

范明